

「安亭事件」的再認識和再研究

◎ 王 銳

發生在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無疑是「文革」時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其重要，國內幾部著名的「文革史」專著，如高舉、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等，對「安亭事件」均作專節敘寫，對事件的成因、結果及影響予以較詳分析論述。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三卷本《周恩來年譜》，對「安亭事件」也有專條敘論。

「安亭事件」已過去快40年了，一切似乎已有定論。不過，筆者在對「文革史」和「文革」人物事件的研究中，卻深感對「安亭事件」有深化再認識和深入再研究的必要。說其再認識，是因為無論是對「文革」進程的改變和影響，還是對歷史人物的命運沉浮，「安亭事件」均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四人幫」中的張春橋、王洪文、江青3人就直接與其關係重大，其他重要政治人物還有陶鑄、陳伯達、陳丕顯等，甚至還有周恩來，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前途，都不同程度受到「安亭事件」影響）。說其再研究，就是「安亭事件」中的一些關鍵性的因素和環節，一些專家學者的著述中，或是語焉不詳，或是有意回避，甚至有些至今仍是疑團。

更重要的是，筆者認為，通過對「安亭事件」的深入研究，對於揭示從「文革」早期開始，毛澤東、江青等人（後來還有林彪一家）如何將中共黨內和共和國高層政治，逐漸演化為「宮廷政治」這一事實和過程，具有極為難得和有說服力「標本」價值。筆者一向以為，「文革」政治的核心和要害，就是深有腐朽氣息的「宮廷政治」，以冠冕堂皇的「革命」之名義，在中國的重現和復活。（關於「文革」宮廷政治的問題，筆者另有專文論述。）

有鑒於此，筆者試圖通過對近年深入發掘的「安亭事件」相關材料的研究，就以下一些關鍵性問題，對「安亭事件」予以進一步的探索認識。

「安亭事件」是突發性事件

「安亭事件」是「文革」早期的突發性事件，還是如一些著述中所說是，此事件是張春橋奉「中央文革」之命，與上海「工總司」的王洪文相互勾結，一手製造的一個「陰謀事件」？這一點，是必須首先弄清楚的。

從掌握的現有材料所揭示的來看，應當說是前者而不是後者。這無論是對作為「安亭事件」的對立面的上海市委，還是作為主要當事人的「上海工總司」的頭頭王洪文、潘國平等人，以及奉命全權處理事件的「欽差大臣」張春橋，以及張背後的陳伯達、江青等人來說，都是突發性的，事前沒有預料，也沒有足夠思想準備的臨時爆發事件。事件的發生、發展，其間經過、突然轉折，以至最後戲劇性結果等，作為台前幕後當事者的他們，通通都沒有料到。

而且，這種結果及其演變，在幕後關注事件發展變化的周恩來，為事件最後拍板，一錘定音的毛澤東，也是事先根本就沒有估計預料到。

這裏有必要簡述一下事件的經過。在筆者接觸到的關於「安亭事件」的眾多資料中，覺得有一份題為《關於「安亭事件」中斷行車的情況》的材料最為簡約精練，除文中「臥軌攔車」稍有爭議外，整個內容也比較客觀。這是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於1979年12月8日，向相關調查人員提供的證明材料，全文如下：

1966年11月10日凌晨，自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一夥，衝進上海火車站，強行登上602次列車。開車不久，接到上級指示：應就地解決問題，不能進京。於是由鐵路領導決定將602次列車扣在安亭站。602次列車上的人員則臥軌攔車，甚至連乘有外賓的14次滬京特別快車也不讓通過。這樣，就將列車攔阻在安亭，造成了滬寧線行車中斷。從11月10日上午9時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時54分止，共中斷行車31小時34分。¹

事件經過大致如此。王洪文等人率領的「工總司」人員之所以要「臥軌攔車」（至於是否有「臥軌」，如上文所述，尚且存疑），是因為其「北上告狀的行動受阻。而之所以要「北上告狀」，直接原因則是因為上海市委對前一天（11月9日）成立的「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持「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三不」方針。換句話說，上海市委對「工總司」既不支持，也不承認。

在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左右了上海局勢大約半年後的1967年5月19日，其機關報《工人造反報》第20、21期合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安亭風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鬥爭史之一》的長文。文章以整版篇幅，用大事記的寫法，逐日記述了從1966年11月初醞釀成立「工總司」到11月16日毛澤東為「安亭事件」最後拍板定案的全過程，記載頗詳。其中，除明顯的派性語言及對「工總司」所作所為的粉飾外，對事件經過的敘寫，筆者認為基本可信。該文記敘的「工總司」成立大會當日到最終釀成「北上告狀」的大致經過如下：

「上海工總司」成立大會原定中午12時在文化廣場舉行，因故推遲至下午2時多才開始，不久，即遭對立派工人先後兩次衝擊。「工總司」方面事先曾提出要主持市委工作的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出席大會，被曹拒絕。好不容易「工總司」人員找到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文豹。要張表態，張推脫說「我不代表市委」，予以拒絕（一位市委組織部副部長確實無法代表市委——筆者注）。會上，上海鐵路局裝卸機修廠有人當場拿出「血衣和兇器」，控訴聲討中共華東局和市委「文革」初期，借運動整人，「破壞文化大革命，迫害革命群眾」。大會結束前，與會人數已達數萬（有說4萬多，有說2萬多人——筆者注）。會後「決定遊行到上海黑市委造反，找曹荻秋算帳」（引用原話），提出要曹在晚上10時半以前接見和答復。其時，天開始下雨，「工總司」人員高聲朗讀毛澤東語錄，一邊冒雨等待。後市委一位張姓幹部出來說，「曹要在友誼電影院接見全體工人」。人群遂湧至友誼電影院（當時等候在電影院內外的人，有說2萬多，有說數千——筆者注）。其中，除一直在場鼓動支持的北京赴滬的「首都三司」、「炮打司令部兵團」紅衛兵外，上海交大「反到底兵團」、「交大革命造反團」等紅衛兵也聞訊趕來聲援助威。3個多小時後，至10日凌晨2時多，曹荻秋並未出面，到會的是上海市委常委、市總工會主席張祺。張表態說：「這個組織（指工總司）嘛，是十六條上沒有的。」拒絕承認。此後，在「跟著紅旗上北京」的呼聲中，數千人湧向上海火車站，欲北上告狀。經多次交涉，於10日清晨7時，有2000多人登上65次快車離開上海北站。至南翔，接上海站指令，改乘602次慢車，於上午8時17分到達安亭車站受阻。²

該材料還顯示，在北上告狀者乘的65次快車還未從上海站發出時，安亭站方已接市委通知，準備了一些食品和開水等。這番舉動，表明上海市委事先早有安排，已決定將告狀隊伍阻於安亭，不讓其前行。

上海市委這樣做，作為地方當局，似乎無可厚非，它要竭力穩定，控制局勢，大批隊伍湧到北京狀告市委，於中央於地方都不是什麼好事情。它當然該全力制止事態的擴大。不過，上海市委卻有一點小小的疏忽，即選擇安亭小站作停車「勸阻」地點，滬寧線其他地段均是雙軌，而恰恰安亭小站這地段是單軌，又是滬寧鐵路的必經之地。這就為王洪文等人攔車中斷滬寧全線交通，將事情鬧大以驚動中央高層的舉動提供了可乘之機。

不過，目前所有的材料都顯示，「安亭事件」對當事雙方來說，都是個突發性事件，而非早有預謀。

上海市委何以堅決反對「工總司」

如前所述，「安亭事件」因上海市委不承認「工總司」並阻止其「北上告狀」的行動而起，那市委何以要持此態度立場呢？這是揭示「安亭事件」成因及後果的一個關鍵所在。當時，上海市委提出的主要理由（也是最有力的理由）是，中央此前的一系列檔及指示，均規定工人不要離廠串聯，不准成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而上海「工總司」恰恰是一些人離廠外出串聯的產物，而且是一個跨行業群眾組織。

無論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8月8日在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簡稱的《十六條》），以及9月5日發出的《關於鐵路企業分期分批地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整頓車站、列車秩序的通知》，9月14日發出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中，都有類似規定。尤其是當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在答復中共安徽省委10月16日的請示中，更是明確告示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關於工人離廠外出串聯問題……堅守生產崗位，不要到廠外去串聯」。

尤其是，鑒於「文革」運動已經開始對鐵路運輸秩序造成嚴重影響和混亂，10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維護鐵路運輸秩序的緊急通知》，其中特別規定：「要遵守鐵路規章制度，嚴禁攔截和阻攔列車運行。嚴禁強迫鐵路局延長列車運行區段，或者改變列車運行方向。」「在車站和列車上任何人都不准用任何藉口妨礙鐵路職工執行任務。」³

上海市委正是依據中央的這些規定和指示精神，對「工總司」採取「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三不」方針，拒絕承認其為「革命行動」。實際上是否認其合法性。對其搶奪列車「北上告狀」，甚至臥軌攔車之舉，更視為胡鬧和非法。這是上海市委最有依據，最能提上桌面的過硬理由。

此外，暗地裏，上海市委還認為「工總司」成員複雜，組織嚴重不純，不可能支持承認它。的確，「工總司」最初成員，多是「文革」初期受壓挨整，家庭成份或個人政曆上，有這樣或那樣「污點」的人，被整受壓後，氣候合適，才起來「造反」。據說，曹荻秋在接到下級轉來的「工總司」赴會要求時，曾不屑地說：「今天的大會社會上的渣滓都出來了。我就不參加！我參加就是犯錯誤了。」⁴

但是，這些並不是上海市委不承認「工總司」的全部理由。筆者認為，以上僅僅是明的一

面，上海市委在此事件所持的態度立場及所有舉措中，還有不便明言的一些東西，即整個事件暗中較量的一面。這就是，「工總司」從成立之時起，其基本目標就是視上海市委為「革命物件」，並最終目的就是要從上海市委手中「奪權」。這個目的和動機，「工總司」自身的「宣言」，以及其主要頭頭心目中，也是這樣考慮和策劃的，上海市委自然也一清二楚。

「工總司」成立，按「文革」時的慣例，發佈其《宣言》。《宣言》中就毫不掩飾地聲稱：

我們要奪權，就是要把人民的權力，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裏奪回來，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⁵

據相關檔案資料，1980年6月5日，已經入獄的王洪文在回答審訊人員的訊問時，有這樣一段筆錄：

問：《宣言》撒出後，第幾天開的會？

答：第二天開的會。

問：《宣言》是什麼內容？

答：原文已不記得了。「工總司」成立本身就是工人運動受壓，市委操縱了領導權，所以《宣言》的主要內容就是要打倒市委——奪權。⁶

事實上，「文革」時的造反，奪權和反奪權，本質上就是政治鬥爭，是一些人（或一個組織）試圖取代執政者掌權地位的較量。上海市委在此情勢下，對聲稱要奪權的「工總司」採取「三不」方針，是必然選擇。一個政權機構，肯定不會去支持將自己當「敵人」，叫嚷著要取代自己的政治組織的存在，更不願見其發展壯大起來。

甚至到後來毛澤東已經表態，實際上肯定了「工總司」的所為，「中央文革小組」更是一邊倒地傾向「工總司」，上海市委也寧肯支持後起的「上海工人赤衛隊」，而不肯真正支持「工總司」。它寧肯冒「犯上」的風險，也不會支持那些聲稱要向自己奪權，一心充當「掘墓者」角色的「工總司」。其核心原因正在這裏。

張春橋到底是誰派出的

「工總司」人員在安亭車站「臥軌攔車」，製造擴大事端的極端行為，大出上海市委意外，震動全國，也震驚中央。上海市委多次向中央反映並求助，中央為平息事態，恢復交通，派出了時任中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專赴安亭，協助上海市委處理「安亭事件」。

後來的事實表明，張春橋此行，不僅對「工總司」，對上海市委的命運舉足輕重，而且進而改變了全國文革的局勢和進程。關於張到底是誰派出的？也是說，張春橋這種全權處置，甚至「先斬後奏」的使命，是誰賦予的？多年來，始終說法不一。然而，弄清張春橋到底是誰派出的，卻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對揭示張春橋在處理事件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以及政治權謀大有幫助。更為重要的是，搞清張春橋到底是由誰派出的，對於揭示張春橋如何依靠其「後黨廷臣」身份，借江青這個特殊後臺，將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國務院副總理身份的陶鑄、李富春等（包括陶、李背後的周恩來）玩於股掌之間的事實，極有幫助和說服力。

接觸到的比較「權威性」的著述資料中，有說是中央文革（或是江青）派出的，有說是毛澤東派出的，有說周恩來、陶鑄派的，有說李富春派出。總之，眾說紛紜，難成定論。主要的

幾種說法是：

高舉、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從「安亭事件」到「康平路事件」》一節中說：「（十一月）十一日，陳伯達給『工總司』拍了電報。當晚十二時，按照毛澤東指示，張春橋乘專車直抵安亭站，第二天上午，張春橋親自出面……」⁷

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安亭事件：上海大動亂的發端》寫道：「安亭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及時向中央作了彙報。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打來電報，……中央文革決定派張春橋回上海處理這一事件。」⁸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之《(1) 「工總司」·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一節裏也持同樣說法：「事件發生後，市委及時向中央報告情況，……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派張春橋回滬說服工人。」⁹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在1966年11月9日條目中也持相同說法：「十一月十日凌晨，『工總司』煽動裏脅一部份人以到北京『告狀』為名，在上海近郊安亭站臥軌攔火車，致使滬寧線交通中斷三十一個小時。周恩來得悉後要陳伯達電告中共中央華東局韓哲一……中央文革小組派了張春橋赴上海解決此事。」¹⁰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陳東林、杜蒲主編的四卷本大型史冊《共和國史記》第三卷中，言及「安亭事件」時也說：「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及時向中央作了彙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回電，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堅決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革命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但稍後，中央文革決定派張春橋處理這一事件，張春橋到上海後，繞過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驅車去安亭……」¹¹

然而，兩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作為當事人之二的陳伯達和王力，對此卻是不同說法。

王力在其回憶錄《「文革」第一年》中，談到「安亭事件」時，是這樣說的：「轉捩點是11月的安亭事件，……最初主席（指毛澤東——引者注）沒管，張春橋是李富春代表常委派他去上海的。任務是恢復通車，鐵路不能中斷。」¹²

粉碎「四人幫」後，已在獄中的陳伯達1979年11月29日在回答有關調查人員的詢問時說：

「是周恩來、陶鑄派張春橋去處理此事的。」¹³

僅就以上著述及材料看即有4種不同說法：1、毛澤東派出；2、中央文革小組派出；3、李富春派出；4、周恩來、陶鑄派出；其中，以張春橋是中央文革小組派出為主，而且，主流專家學者也傾向於這種說法。

可能，他們持此種說的主要依據是：其一，張春橋當時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其二，張春橋赴安亭後主要也是向中央文革小組聯繫商量與回報；其三，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表態與處置，基本上代表中央文革小組的意圖甚至可以說是對中央文革小組有利。

不過，筆者在多方研究與考證後卻以為，王力和陳伯達的說法更加可信一點。張春橋的安亭之行，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派出，而是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派出。這不僅因為陳伯達、王力是當時中央文革小組要員，處於核心當事者、知情者的重要地位，對事情前後經過及相關細節比較知情，同時，還基於以下幾點：

第一，從事件的性質及中央處理事件的基本要求看，「安亭事件」是攔火車阻斷鐵路交通，中央派張春橋去上海，如王力所說，「任務是恢復通車，鐵路不能中斷」，並不具體解決承認「工總司」合法性問題。一般來說，這屬於黨中央和國務院管轄處理的範圍。因此，張春橋的派出，應是周恩來、陶鑄等幾個政治局常委決定的，而非中央文革小組決定。

第二，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的康生、陳伯達、江青等「文革」派勢力人物對文革局勢，基本上都是抱著任由亂起，以此向中央施壓（先是劉少奇、鄧小平，後是周恩來、陶鑄等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或是亂中謀利。因此，凡是各地學生紅衛兵、造反派（包括軍隊內部）鬧起的各種事端，中央文革小組大都是袖手旁觀，坐收漁利，很少主動派人出面去解決處理，平息亂子。最典型的就是幾乎同時（1966年11月初）發生在北京的軍事院校學生圍攻衝擊國防部大樓事件。

據劉志堅將軍回憶，1966年11月初，軍事院校紅衛兵圍攻衝擊國防部大樓時，中央文革小組先是煽風點火（陳伯達寫條子作「軍令狀」交給學生，說「將軍們到這裏來，我們相信你們不虐待他們。如果出了什麼事，唯我陳伯達是問。」實際上是借此鼓勵紅衛兵揪鬥部隊將軍，衝擊軍事機關），後來事態嚴重時，又坐視不管。致使11月8日，發生了更大規模的衝擊國防部大樓的嚴重事件。600多外地軍事院校紅衛兵，包圍國防部大樓一整夜後，於8日凌晨，突破二個營警衛部隊組成的人牆，打破窗玻璃，將木板一頭搭在窗台上，一頭搭在警衛戰士的頭上，踩著木板衝進大樓。一直沖到6樓，並打傷警衛戰士。國防機密受到威脅，情況十分危急。葉帥及全軍文革領導無法控制事態，提出了一個處理方案，報林彪。林彪那裏卻遲遲不答覆。中午時分，林彪才讓秘書張雲生打電話來，不同意抓鬧事者，也不同意叫學生寫檢查，實際是否定了葉的處理意見。中午吃飯時，才報告周恩來總理。周恩來覺事態嚴重，立即在人大會堂召集緊急會議，討論處置辦法，葉帥、肖華、劉志堅等軍方將帥應時前往，中央文革小組只來了個已經受江青一夥排擠，沒什麼權力的穆欣來應付，採取坐視不管，隔岸觀火的態度。而最後，周總理、葉帥等在人大會堂的會還沒開完（因提出的方案周總理為慎重計，再報林彪，林彪始終未作答覆），這邊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卻又寫了個條子，派小組成員戚本禹到現場念了一下，讓學生退走了。¹⁴

從這個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小組對當時各地動亂事件的態度，一般是坐視不管，甚至暗中支持、煽動，而決不會主動派出人員去處理解決，平息事態。兩天後的「安亭事件」，若不是周恩來、陶鑄、李富春幾個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政治局作出決定，中央文革小組是不會主動派出張春橋去處理平息事件的。

第三，有材料揭示，「工總司」從醞釀到成立，一直到「安亭事件」發生，都有北京來的「首都三司」及「炮打司令部兵團」的人員介入其中。而首都三司等紅衛兵組織，一向被看作與中央文革小組聯繫密切並暗中操縱的「通天造反組織」。因此，「工總司」成立，及「安亭事件」背後，應該有中央文革小組的影子。倘如此，中央文革小組更不會主動派出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赴上海。

第四，當時在安亭現場隨時向中央通報事件進展情況的，有一為叫甄文君的記者（他名義上是《解放軍報》記者，實際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組駐上海的聯絡員）。張春橋11日夜抵達安亭開始與「工總司」談判後，以及談判過程及情況種種，甄文君及時向中央回報詳情。現存檔案材料中，有份題為《張春橋同志和上海要求赴京工人談話情況》的原始電話記錄，是甄文君均11月12日下午5時10分在安亭現場打給周恩來的。甄文君作為中央文革小組駐滬聯絡員，回報安亭事件現場動向的電話都直接打給周總理而不是中央文革，只能說明整個「安亭事

件」的處理，起初階段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過問和掌控中。派張春橋赴上海會同上海市委一起處理、平息事態，恢復通車的決定，以及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小組發的那封電報，都是周恩來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春橋、陳伯達分別執行（陳伯達致安亭「工總司」人員那封電報，某種程度上說，其實並不真正是陳伯達和中央文革的意思，而是周恩來為首的政治局常委的意思。這封電報的內容，「工總司」方面不滿意，在現場的張春橋也不滿意，躲在幕後操縱的江青更不滿意，以後毛澤東對此也不甚滿意。原因正在於此）。

不過，王力說是李富春派張春橋，陳伯達的說法則是張是周恩來、陶鑄派出的。如何解釋兩種說法的矛盾呢？筆者認為，其實並不矛盾。從以上三人當時的身份來看，周恩來、陶鑄、李富春均是政治局常委（由此更說明張春橋是由政治局常委會派出的），以周恩來為首的常委做出了決定，安排李富春代表常委向張春橋佈置（周恩來、陶鑄沒空或是不便）。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其時，經周恩來向毛澤東提議，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工作，實際主持國務院事務。所以周恩來、陶鑄讓他出面向張春橋交代任務，也是適宜的。綜上所述，張春橋當初赴上海安亭，全權處理「安亭事件」的使命，是由周恩來為首的政治局常委決定的和賦予的，而非中央文革小組。

然而，其間有個小小的細節，即張春橋領受任務動身上海之前，曾私下裏見過一次江青。據王力回憶：「張春橋在去之前，不認識王洪文。李富春交待任務後，他找了江青。」王力還說：「我當時兼辦公室主任，我要給他派人協助，他堅決不要，說『我有人』。這件事，總理沒出面。」¹⁵

可以說，也正由於有這樣一個細節，張春橋才會有後來在「安亭事件」處理上那一番膽大妄為，一手遮天的舉動。張春橋這個舉動，很耐人尋味。其為人的城府與計謀，以及暗中同江青的特殊關係，於此也可見一斑。

張春橋對事件的處理也擔著風險

據記載，張春橋動身赴滬之前，陳伯達已根據周恩來的意思，以中央的名義擬了一份致安亭「工總司」赴京人員的電報，這份電報內容，也給張春橋看過。陳伯達這個電報，許多關於安亭事件的著述中都引用過，限於篇幅，筆者這裏不再引述。陳伯達這份電報的主要精神就是，要鬧事的工人返回上海，有問題回上海去談去解決。陳伯達電報中，特別強調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要鬧事者「堅守生產崗位，完成國家計畫」，又說「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搞好生產就是大道理」。電報體現的就是周恩來為首的政治局常委一線領導層的意圖。這種在全國已經開始大亂的大背景下，千方百計穩定大局的意圖，其實也是得到毛澤東本人點頭同意或批准的（當然，後來毛澤東改變了初衷）。

王力回憶說：

1966年，在沒搞到工礦農村時，先是大串聯把鐵路亂了。鐵路一亂，首先是煤運不出來了，沒有煤炭，有的工廠就不冒煙了。總理每天管鐵路調度，也每天抓煤炭。中央工作由總理主持。當時還堅持兩條：一是不能停產鬧革命，工礦農村不許大串聯，二是工廠不搞跨行業的組織。這是總理在陶鑄、李富春等同志協助下抓的，主席批准的。¹⁶

然而，不幸的是，「安亭事件」「把這兩條衝破了」（王力語），也才有以後的全國大亂及所謂「一月革命」的奪權。可以說，造成這種局面的罪魁禍首就是張春橋和江青。

張春橋11日晚乘專機抵達上海。到上海後，他首先給在北京的陳伯達掛電話，請示性地問：「是先到上海市委去，還是先到群眾中去？」陳伯達因周總理等的要求和關注，急於平息事態，答覆說：「先到群眾中去，趕快制止群眾到北京來。很快把問題解決了。」張即驅車到安亭。可見，張到上海後不與市委碰頭即去安亭現場，是奉命而為，倒也不是自作主張，也不是有些著述包括《陳丕顯回憶錄》等裏所說那樣，是他個人在玩陰謀或權術。

張春橋在安亭的談判情況，前面提到那位元駐滬記者甄文君12日下午給周總理的電話回報中有具體記載：

張春橋同志昨晚9點多抵滬，即赴安亭車站，跟9個工人代表談判，談判中間有波折。9人中有3個同志同意說服工人回上海，6個不同意。一直談到天亮，未達成協定，他們堅持要步行去京。

今早7時，春橋同志又到現場找工人談話。

工人對伯達同志的信（按即電報）有意見，說只講生產，不講革命，他們不同意。有些人談起來情緒激昂，進行控訴。

現在看，有少數人是堅決主張到北京的，他們起領導作用。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上海聯絡站支持他們。

……

擠在安亭的工人，生活問題市委已注意，不會出問題。

鐵路交通，昨已恢復，工人的那一列車，停在叉道上。

張春橋同志還在安亭。¹⁷

由此看來，張春橋最初在安亭與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人員談判中，還是基本遵照了李富春代表政治局常委會給他任務時交代的原則，以及陳伯達電報精神行事的，尚沒有大的出格。而且整個談判不大順利。

13日，張春橋從安亭返上海，準備與對方就承認「工總司」的合法性問題繼續談判。此時，中斷30多個小時的滬寧線已經通車。按說，中央當初給他交待佈置的「任務是恢復通車，鐵路不能中斷」，其基本使命已經完成。他可以返京復命，將剩下的事情交上海市委處理，或是留在上海協助上海市委處理。

然而，張春橋在此時卻轉了一個180度的大彎，其充當的角色和使命都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13日下午，在上海文化廣場，張春橋出人意外地同意「工總司」那個著名的「五條」，並當場在「工總司」負責人潘國平同紅衛兵共同草擬的「五條要求」上簽字。

這個「出人意外」，恐怕不止是出乎上海市委意外，也出乎在北京的陳伯達、陶鑄、李富春、周恩來等人的意外。而僅僅在一個鐘頭以前，在康平路市委大樓會議室裏，張春橋剛剛同華東局、上海市委領導碰頭並形成了不承認「工總司」的共識。其間，還與在北京的陶鑄通了電話（張春橋亦親自與陶鑄通話），包括張春橋在內一致同意陶鑄代表中央表達的意見。可在文化廣場，張春橋卻突然變卦。

也正由此，作為上海市委主要負責人，張春橋頂頭上司的陳丕顯，在「文革」後的回憶錄還感歎說：

張春橋在處理「安亭事件」的整個過程中，耍盡了政治手腕，陰一套，陽一套，利用中央文革的特殊地位把市委一步步逼向絕境。¹⁸

關於當時的現場情況，時為曹荻秋秘書的糜欣祥，於1979年12月1日寫的一份揭發性材料中，有所披露：

(11月13日)下午，華東局和市委的負責人在康平路辦公室103會議室碰頭，張春橋也參加了。碰頭會剛開始，曹荻秋同志要我掛電話給陶鑄同志，有問題請示。在104室，荻秋同志同陶鑄同志通話後，電話沒掛斷，又要我叫張春橋出來聽了電話。我當時在旁邊聽了一方面的話，明確的印象是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事後證明，確是這個精神）。華東局和市委負責同志一致同意陶鑄同志的意見，張春橋當面並無異議。3點多鐘，張春橋到文化廣場後臺談判，突然違背了中央、華東局和市委的精神，個人簽名同意了「工總司」的第一個「5條要求」。¹⁹

關於這個「五條意見」，當時被印成傳單或刊於「文革小報」在全國各地廣為散發，傳抄件也有多個版本，不過，文字大同小異。據「工總司」機關報《工人造反報》上那篇《安亭風暴》（這是「工總司」自己公佈的文字版本，應當說可靠性較大），所載如下：

下午三時卅分，張春橋同志在文化廣場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同意工人群眾提出的五項革命要求，即（一）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組織；（二）承認十一月九日大會以及工人被迫去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動（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應該派少數代表）；（三）這次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五）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張春橋同志還簽了字。

據說，第二條括弧中「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應該派少數代表」，這一句話是張春橋親筆加上去的。

至此，張春橋在全國開了一個比較特殊的先例，此舉在全國以及中央高層引起的震動是極猛烈的。平心而論，張春橋這樣做，是需要相當膽量，也為此承擔著很大風險。因為，此舉意味著他不僅將自己置於上海市委的對立面，也將自己置於名義上的頂頭上司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並有政治局常委身份的陳伯達，以及中央一線領導周恩來、陶鑄、李富春等的對立面。他除了那群對他歡呼鼓掌的「工總司」造反派外，支持者中僅剩下他單線聯繫的江青了。張春橋此時的處境，真正可謂「孤軍奮戰」。不過，張春橋似乎有恃無恐，毫無顧慮地一意孤行下去。

筆者認為，張春橋之所以如此，恐怕很大程度上與他離京前一刻，與江青面談有關，他可能自認為握有江青這張「王牌」，自是能夠穩操勝算。張春橋這種「後宮廷臣」的特殊身份和視角心態，於此也可見一斑。

儘管如此，張春橋此舉仍是擔有相當風險的。這個「風險」，就是最後毛澤東的態度，將決定他此舉的成敗和個人政治生命。「文革」初期的1966和1967年，發生在他身邊，那些同樣持極左觀點也一度受寵之極的中央文革要員身上，就有兩種極端的例子，一是支持聶元梓等人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康生，二是因「揪軍內一小撮」揪過頭了的王、關、

戚。兩者因毛澤東審時度勢的不同需要，一個獲得毛澤東首肯而被捧上了天，躋身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而中共「十大」成為中央副主席，而另一夥卻因此獲罪進了秦城監獄，做了10年階下囚。

所以，張春橋在「安亭事件」中的作為，仍然如同在表演「高空走鋼絲」，一不小心隨時有摔下來粉身碎骨的危險。

如同幾個月前，毛澤東在杭州批准，將聶元梓那張大字報配上評論員文章送中央電臺廣播後，身在北京的康生聽此消息發出「聶元梓解脫了，我也解脫了」的感歎一樣。這次，從北京傳來自己的「安亭事件」獲肯定的資訊後，張春橋自己終於大大松了一口氣。幾天後他在蘇州，也發出了類似康生的那種感慨。

3天后的11月16日，他在蘇州的鐵路中學接見「上海工總司」部分人員，談到他當初簽字同意「五條意見」時，不自覺流露了當時那種比較複雜微妙的心情，他說：

到文化廣場我明確表示了我的意見。……我組織手續不完備，沒有和華東局商量，也沒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沒有和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因為來不及，就下了決心，然後從文化廣場回到我住處，才給陳伯達同志打電話，把同志們剛才對我、對陳伯達的批評告訴了他。（他聽說了這樣的話心裏很不安）。並且也把5條協議以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報告他。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就討論我在文化廣場所講的5條。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認為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完全是正確的，是應該這樣做的。……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都參加了會議，他們認為我這樣做是正確的。²⁰

可見，當時張春橋自己還是意識到這樣做的巨大風險，心裏也隱隱感到擔心。

1個多月後，張春橋在與上海「工總司」的談話中，又提到此事。不過，此刻他的口吻已完全是勝利者姿態，語氣裏頗有幾分洋洋自得了：

「在蘇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兩個小時。那時鬥爭很激烈。要他簽字也不簽。我說，你不簽，我簽！後來，他沒辦法，只好簽了字。韓哲一也簽了字。」²¹

江青所起的關鍵作用

談及「安亭事件」，大多數史家學者，多談及王洪文和張春橋兩個當事人物的作用，其後是陳伯達和陶鑄等，但很少有談及過江青。可見江青在「安亭事件」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及發揮出的關鍵性作用被忽視了。

其實，仔細研究「安亭事件」的材料及相關過程，可以發現，整個事件最後出現那種大逆轉的結局，江青的態度和作用是關鍵性，也是本質性的。只不過，這次江青是躲在幕後操縱大局。這也透出「宮廷政治」的味道。

從「安亭事件」的結果來講，江青也是個勝利者，而且是雙重的勝利。在中央文革小組內，她不僅壓過了組長陳伯達，也壓過了身為顧問的陶鑄，而且這兩個人還都是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後，陶鑄、陳伯達的地位開始下降。而在中央文革小組之外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她壓過了身為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而且當初派出張春橋的李富春，也壓過了實際

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一句概括，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加上來（當然，劉、鄧以及朱德早就靠邊站了）也抵不過她江青一個人的力量。這就是「安亭事件」所顯示出來的中國當時極不正常的畸形政治格局的實際情形或者說「內幕」。

江青最初在「安亭事件」中顯示出來的隱形作用是，張春橋接受赴安亭的使命後，專門去見過江青。也正由於有了江青私授的「錦囊妙計」，張春橋在處理「安亭事件」時才表現得腰杆那麼硬，可以睨視一切，不管不顧。

張春橋11月13日下午在文化廣場簽字表態後，遭到上海市委的猛烈反對和抨擊。因為這等於是身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春橋，為了某種政治考慮和政治利益，在「工總司」面前把自己的頂頭上司賣了（按職務，陳丕顯和曹荻秋都是張春橋的上級，只不過張春橋多了一個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市委主要領導陳丕顯、曹荻秋連續給中央打電話質問。先是打給陶鑄，陶鑄對張春橋此舉感到很突然，很震驚，略加思索，又乾脆明確地回答說：「不行（指張春橋簽字的五條意見——筆者注），要堅持中央原來的政策，張春橋這幾條不合適，要採取補救措施。」

之後不久，陳丕顯又把電話打到陳伯達那裏，其時，恰好王力也在旁邊，王力見證了陳伯達和陳丕顯通話的全過程，王力回憶錄中記述了其中一些細節：

這時我正同陳伯達在一起。我聽到陳丕顯態度鮮明地進行責問。陳伯達的態度是勸陳丕顯，說我的老鄉，不要那麼發脾氣，冷靜一點，這問題很大，不要匆匆忙忙地表態，字已簽了，中央再研究。²²

據王力回憶，對張春橋之作為憤怒已極的陳丕顯，對著電話，還對陳伯達講了許多不大客氣的「很厲害」的話。陳丕顯在電話中質問陳伯達：「你們的一個文革小組副組長，究竟有沒有權力，背著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與群眾組織簽訂反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決定？第二，究竟還要不要國家法律？」

陳丕顯這裏談到了核心問題，而且還將之提到「國家法律」的高度。可惜，如今他遇到的，是幾個「無法無天」的對手。江青在「文革」中一直聲稱自己是「無法無天」（當年毛澤東也稱自己是「無法無天」），張春橋師出江青門下，在「安亭事件」的處理上，確實也來了個「無法無天」，膽大妄為。

陳丕顯的回憶錄對他與陳伯達通話情形作了詳盡回憶：

我是當天晚上在西郊賓館從曹荻秋、魏文伯他們那裏得知這一消息的。大家對張春橋的卑劣行徑十分氣憤。當場我就給陳伯達打了電話。王力接的電話，他經常給陳伯達當翻譯，因為很多人聽不懂陳伯達的福建土話。我對王力講，我也是福建人，不要你作翻譯。在電話中我把處理「安亭事件」的情況向他作了簡要彙報，特別提到了張春橋背著市委同意上海工總司提出的五條無理要求。接著，我非常生氣地質問陳伯達：「為什麼中央文革原來說不承認這樣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現在怎麼又突然轉為承認了呢？為什麼張春橋在簽字之前不同華東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給了張春橋多大的權力？為什麼一切後果反而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承擔呢？」陳伯達和王力被我問得無話可說。陳伯達只好講：「對張春橋，是想讓他鍛煉鍛煉的。事情發生在上海，你們負一點責任吧。」可是後來我的這些話卻成了我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²³

陳伯達接畢陳丕顯的電話，方知事情的嚴重性。儘管他在電話中以「上司」的口吻，說不過

是想讓張春橋「鍛煉鍛煉的」，不過，他知道自己大概已經無能為力了。當然，他在勸解安慰陳丕顯時，似乎還抱有一線希望，所以告誡陳丕顯說：「這問題很大，不要匆匆忙忙地表態，字已簽了，中央再研究。」

這樣看，陳伯達內心也是不贊成張春橋簽字的。儘管他們都屬於「文革」派，而且對「文革」進程，也抱有同樣的激進觀點和立場，但是他還是覺得張春橋此舉太出格、走得太遠了。正思索間，張春橋的電話來了。張春橋的電話中自然是大講一通「這個字不簽不行」的理由，說些「不能同工人對立，不能壓制革命」等冠冕堂皇的話。

陳伯達不好再表示什麼，正如王力所說，「陳伯達知道張春橋的份量」。即張春橋背後有江青撐著（據說，張春橋進入中央文革小組並任副組長，也是江青力爭的結果）。思索一陣，陳伯達當即拉著王力一起去見江青。因為他從陳丕顯的電話中已知道陳丕顯先找了陶鑄，知道了陶鑄堅持中央原定精神，反對張春橋簽字的做法，而且聲稱要立即採取「補救措施」的情況。在此情勢下，恐怕只有江青才能「力挽狂瀾」了。

果然，江青一聽陳丕顯找了陶鑄，而且明白了陶鑄的反對立場，江青此時也急了。據王力說，此時的江青顯示出少有的果斷，她當即表示她要立即趕去見毛澤東，「要搶在陶鑄前面，不能等到明天。」江青這樣對陳伯達和王力說。²⁴

江青很明白事情的嚴重性和緊迫感：若是陶鑄搶在他們前面，向毛澤東作了回報並獲得毛澤東認可後，張春橋的安亭之行不僅前功盡棄，而且處境就危險了。

江青在整個安亭事件中的關鍵的、決定性的作用，就此顯現出來。她要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影響毛澤東，搞「宮廷政治」，儘量說服毛澤東，作出有利於自己的決策。

據筆者認為，江青在關鍵時刻（或者說是「危急時刻」）單獨求見毛澤東，影響並最終讓毛澤東在重大關頭改變主意的情況，在「文革」前幾年中，除這一次外，起碼還有兩次。這些都是「宮廷政治」的典型表現。

一是1967年2月的「懷仁堂事件」，幾位老師和副總理「大鬧懷仁堂」，怒斥中央文革，江青當即拉著王力、張春橋等人緊急進見毛澤東，最後讓毛澤東出面而扭轉了局勢。「懷仁堂事件」因之被定成「二月逆流」，幾位老師和副總理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受貶遭迫害數年之久，「文革」局勢也發生根本性變化。

另一次是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上，已投靠林彪的陳伯達與林彪一夥，聯手興風作浪，以有人反對毛澤東為名，對張春橋發動突然襲擊，最後發展到「揪人」的地步。危急時刻，也是江青出面，緊急向毛澤東求救。最後搬出毛澤東力挽狂瀾，造成陳伯達「廬山翻船」，林彪一夥也由此開始走下坡路。

「文革」中這幾次政治較量中，都是江青在關鍵時刻，起了決定性作用。江青在「文革」時期的這種特殊能耐，不用說其他人，連周恩來也不敢小視。在同江青打交道時，周恩來也總是小心翼翼，審慎從事。能爭取的儘量爭取，不能爭取的就只好忍讓，退而求其次。

事情果然如江青所料地發展下去，毛澤東在關鍵時刻，不支持陶鑄、李富春、周恩來等一干常委，而選擇了支持了江青和張春橋，甚至為此改變了自己的初衷（也改變了當初整個「文革」戰略和佈局）。這一點對分析「安亭事件」的結果和影響來說尤為重要。

從毛澤東那裏吃到「定心丸」後，江青躊躇滿志，當晚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肯定並通過了張春橋在「安亭事件」中的那五點簽字及全部表態和舉動，並立即電告了在上海等候消息的張春橋。這就是張春橋11月10日在蘇州鐵路中學頗帶點自得神情對「工總司」部份人員說的：「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認為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完全是正確的，是應該這樣做的。……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都參加了會議，他們認為我這樣做是正確的。」²⁵

同時，江青、陳伯達還讓王力於第2天電告上海市委，正式宣佈中央文革小組同意張春橋在上海就「工總司」問題的簽字。電話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接到的。據說，王一平接完王力的電話後，氣憤之下罵起了粗話，他當場在辦公室破口大罵：「王力支持張春橋五條，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爺自己下來處理問題吧！」²⁶ 王一平這番舉動，後來被認為是「狗膽包天」，並因之而獲得「炮打中央文革」的嚴重罪名。

整個「安亭事件」，如王力所說，「這件事，總理沒出面。」不過，周恩來仍是隨時注視著事態的發展和處理情況。中央文革駐滬特派員甄文君就「安亭事件」處理進展情況直接向周恩來辦公室的回報，便是很好的說明。陶鑄對著件事的處理和表態，應當說，既是代表中央，其實也就是周恩來的意思。若是沒有周恩來的認可或同意，陶鑄想來是不會說出「要堅持中央原來的政策，張春橋這幾條不合適，要採取補救措施」這樣強硬的話來。因為這明顯是要得罪張春橋，實際上也就是要得罪江青。陶鑄自上調中央後，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是支持周恩來，和周恩來站在一起的。這是陶鑄讓江青等人失望，不滿，並導致最終倒台被囚的主要原因。

就在「安亭事件」處理期間，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11月13日。周恩來在陶鑄陪同下，與陳毅、賀龍、葉劍英、肖華、楊成武等將帥一起，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軍隊系統各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是「全軍文革」組織的，有10多萬人參加，聲勢浩大。會上，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老師在重申軍隊不能亂的同時，對「文革」中的一些極左過激做法作了抨擊。周恩來與陶鑄在開會前，特地繞場一周，表明對這次大會的支持態度。後來，此次大會及11月29日的大會，均被江青、康生等人視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毛澤東對此亦對周及幾位老師表示不滿。

據說，江青聽到這次大會情況後，簡直是暴跳如雷。據時任「全軍文革」組長兼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劉志堅將軍回憶，江青當時是「氣急敗壞地指責說：『軍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²⁷

筆者認為，不排除的一種情況是，這次軍方將帥顯示態度和力量的大會（又得到周恩來、陶鑄公開支持）讓江青感到了壓力（如同1967年2月的「懷仁堂事件」一樣），而如果在「安亭事件」的處置上，張春橋代表的「文革派」勢力再輸了，那她和她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日子肯定更不好過。所以，才急於搶在陶鑄前面見到毛澤東，先入為主地為「安亭事件」定性，以穩定中央文革小組的陣腳。

這一招果然靈驗，江青依靠與毛澤東那層「特殊關係」，終於在「安亭事件」處理上獲勝，顯然，「宮廷政治」佔了上風。

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後，周恩來獲得了毛澤東肯定張春橋在上海簽字表態的消息。周恩來自然也是大出意外，震驚之餘，他只好違心地採取相應行動。在當時情況下，他只能緊跟毛澤

東，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據《工人造反報》上，《安亭風暴》那篇大事記的記載：「十一月十四日……這一天，中央常委開會，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組對『安亭事件』的處理。」²⁸

高舉、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表述也差不多：「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常委召開會議，同意中央文革小組對『安亭事件』的處理意見。」

不過，《周恩來年譜》及其他兩部「文革史」中，卻沒有這次常委會的記載。個中原因，不得而知。

毛澤東最後拍板的動機探究

毛澤東最後為之拍板，並親自出面召集高層會議，為之給出說法和依據，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安亭事件」才終於塵埃落定。

據各方記載，毛澤東是11月16日召開介於正式和非正式之間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為「安亭事件」給出一個說法的。說其這次會議「介於正式和非正式之間」，是因為，若是說正式常委會，但8月11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等4位常委（其時均在北京），未被通知參加。另一位常委是副主席林彪也未到場。而不是常委的江青、王力卻又與會。若說非正式，但確實又是毛澤東以中央主席的名義親自召開的常委擴大會，所以只能稱其「介於正式與非正式之間」。

毛澤東此舉顯得很特別，他在會上的講話及舉動就更顯得特別。他出人意料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帶到會場，在會上當眾拿出《憲法》為自己（其實是為他從未見過面，而且是第一次聽說名字的「工總司」王洪文）找法理依據。

從人民共和國有《憲法》以來的10餘年間，毛澤東把《憲法》帶到會場，當眾掏出《憲法》為自己的言行找「憲法依據」者，筆者的記憶中，似乎只有兩次。第一次是1964年，他和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後，在過完自己71歲生日第三天的12月28日，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毛澤東帶著《黨章》和《憲法》兩個小冊子到會場上。剛坐定，他便對台下揚起兩本小冊子說：「請你們回去也找《黨章》和《憲法》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

接著，毛澤東又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台下一片寂然，許多人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毛澤東繼續說下去：「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一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不點名說的，一個是劉少奇，另一即是鄧小平。²⁹

毛澤東這番舉動真是很有意思：自有《憲法》以來，《憲法》在共和國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毛澤東心中自然明白，在座諸君，想來也明白。居然在黨內高層會議上用《憲法》和《黨章》為自己找依據，而且談到所謂「言論自由」。毛澤東對政治權術的運用，真是很有幾分想像力！

這天會議上，毛澤東的講話和相關情形，只有王力的回憶錄中有所披露。王力作為與會者之一，算是絕對的知情人，他對會議情況的記敘很具體，並富有細節。

第二天下午三點鐘左右，主席在釣魚台十二樓召開常委擴大會。參加的有常委、部分文革小組成員，但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未參加。文革小組參加的有江青、王力。在主席那裏開會，小範圍的會一般只有江青和我，大一點的有關鋒、戚本禹。……在這個會上，主席主要講上海問題，講話很短，他拿出憲法，念其中的「結社自由」一段，針對陶鑄和陳丕顯說：「工人有沒有結社自由？憲法你們看不看？」並說：「上海問題，張春橋是對的。先有事實，後有政策。」原來在電話中，陳丕顯在這個問題上講得很厲害，……主席用憲法來回答陳丕顯，還講了政策從哪裏來的，講了理論和實際的關係，又用哲學來回答。³⁰

毛澤東在這個常委擴大會上的舉動和講話同樣也很有趣，他既宣講了《憲法》條款，又講理論問題，還談哲學。先是給與會者念《憲法》中的「結社自由」條款，為王洪文成立「工總司」辯護和尋找「法律依據」，並針對在座的陶鑄和不在座的陳丕顯發出質問：「工人有沒有結社自由？憲法你們看不看？」之後，又回到開會的主題，即關於「安亭事件」，中央文革與中央常委分歧的關鍵即核心問題，肯定「張春橋是對的」。談後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為張春橋「先斬後奏」之舉辯護。說出「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政策」之類的話。最後用比較玄妙的哲學回答。

毛澤東這番講話，在為「安亭事件」最後拍板的同時，肯定了兩個人，這就是王洪文和張春橋（當然，還有張春橋背後的江青），也打擊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分別是陳丕顯和陶鑄。而毛澤東當場沒有說出的另外之潛臺詞則是：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常委和國務院對「安亭事件」的態度和處理是錯誤的。

所以說，毛澤東這個不長的講話，明批的是陳丕顯和陶鑄，暗中實際上敲打的其實是周恩來。周恩來自然是聽出了毛澤東的弦外之音，他和陶鑄一樣沉默著，只能接受這個既成事實。王力也承認：「在這種情況下，誰還能說話？但原來正確原則主要是總理定的。因為陶鑄出面支持陳丕顯，所以陶鑄也成為批評的對象。」

毛澤東這種態度突然轉變，當然與頭天江青緊急求見他，與他的談話有關。「宮廷政治」在這裏成了關鍵因素。

不過，周恩來、陶鑄在「安亭事件」當初一直堅持的「中央的原則」，其實也是經過毛澤東同意或批准的原則，並不是周恩來、陶鑄自行其實。這反倒是毛澤東自己出爾反爾，臨時改變了他原來的設想和部署。

毛澤東（尤其在「文革」中）經常性是突然改變原有打算和安排（包括對人和事的態度）。甚至自己否定自己，讓人無所適從。紀登奎在1980年代對來訪的記者比較客觀地評價過毛澤東，他說「毛澤東文章寫得不錯，話也說得好，但他自己往往出爾反爾，違背自己的思想。」³¹ 紀登奎如華國鋒一樣，「文革」前後都一直被毛澤東看好，並從地方調到中央核心層，曾一度被作為「接班人」之一被培養。那些年，紀登奎確實有很多機會近距離觀察毛澤東，因此這個評價大致不差。其他好多人，也有類似評價。比如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做秘書的田家英，也私下對人說過毛澤東的一些性格特點，「特別是有時意見多變，不易適應。」田家英因此想調出中南海，離開毛澤東身邊。（李銳：《大躍進親歷記》）

前面所引用的《王力回憶錄》就已經談到過，儘管10月以後「文革」動亂加深，但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始終堅持著兩條，即：一，不管工礦農村，職工農民，都不能停產「鬧革

命」，也不許大串聯。二，是工礦企業和單位，不能搞跨行業組織。這兩條底線，也是毛澤東本人同意的，或者說是他原本的意思，由周恩來在陶鑄、李富春協助下執行著。「文革」動亂中各省、市、自治區發生的鬧事和突發性事件，也堅持按以上原則處理。陶鑄對「安亭事件」的表態和處理，其實堅持的也是這兩條底線。而張春橋的簽字，卻是明顯違背了這個底線。

而今天的會上，毛澤東反而批評堅持中央方針的陶鑄和陳丕顯，卻完全肯定違背中央方針膽大妄為的張春橋，而且千方百計地從理論、從哲學方面來為其既反市委又反中央的行徑辯解，這於法於理都不通。

毛澤東這種舉措，只能表明是他自己態度立場的已經有所轉變。考察起來，促成這種轉變的原因，江青頭天的進言起了很大作用，但不是最關鍵性的。筆者以為，最關鍵的，恐怕還是毛澤東自己對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以及對「文革」運動的深度和廣度，在江青等人的連續進言和影響下，又有了新的認識和考慮。

「安亭事件」徹底改變了毛澤東「文革」部署

毛澤東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作出一番深思熟慮並花了較長時間醞釀準備的。對這場「文革」運動的目標、物件、進程、大致範圍、進行時日、具體部署，事先是有所考慮和預想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10年「文革」，毛澤東當初設想的，絕對不是現在人們看到的這個樣子。無論是這場運動的時限、進程，以及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應當說，與毛澤東當初設想或計畫的，相去甚遠。

先說關於「文革」時限，最初說的是幾個月，後來說一年左右（即兩個五個月或者更多），以後又說的是三年，即「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再後，就成了遙遙無期，最後整整弄了10年有多，直到其去世才終結。

王力在《「文革」第一年》中回憶說：「毛主席最初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後來完全不一樣。最早說的是搞3個月，後來說半年，然後又是一年。在我被打倒前，他說3年。」

除了王力的回憶錄，還可以找到另外的依據。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親自主持並多次講話，林彪、陳伯達等亦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會議原定7天，結果開了20天。會議的第二天，葉劍英在第二組的會議上發言說：「主席說（指毛澤東——筆者注），這次運動暫定搞到明年1月，還有4個月。十一中全會後搞（了）兩個月，要很好地總結經驗。」³²葉劍英在會上當眾這樣講，而且直接指明是毛澤東說的，若毛澤東沒有對他講過，他肯定不敢這樣說。

第二個例證則直接來自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在10月25在大會上作長篇講話，談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起因、進程等相關問題。在談及對這次「文革」運動的初步安排、打算及時限時，他說：「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³³

「兩個5個月或者多一點」，也就是1年左右。從當時的1966年10月，再有5個月左右，也就是到1967年春節後2、3月間，這與葉劍英的說法也是大體吻合的。可見，毛澤東當初確實是準備在1967年第一季度，就將「文革」運動收尾結束的。

再說關於「文革」運動的物件，如劉志堅將軍回憶，最早限定在「五界」，即毛澤東批准下發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指明的「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甚至這次運動將涉及到（即要打倒）的具體人數（全國範圍來講），毛澤東在當年6月份（「文革」大規模展開期）與外賓的一次重要談話中，將其限定在「幾百人」到「幾千人」之間。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來訪的越南勞動黨中央主席胡志明。其時，正是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以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人民日報》發表。「文革」在全國轟轟烈烈展開，運動如火如荼，高潮迭起。毛澤東在對胡志明解釋並談及當前的「文化大革命」時，說：「我們最近這場鬥爭，是從去年11月開始的，已經7個多月了。最初，姚文元發難。他是個青年人。討論清官等問題。……現在我們不搞清官、貪官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藝界、學術界、哲學界、史學界、出版界、新聞界。」談及這場運動可能被打倒整倒的人數，毛澤東說：「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³⁴

這裏，毛澤東將「文革」運動物件，甚至可能整倒的人數等，說得非常具體。

毛澤東對胡志明說的「教育界、文藝界、學術界、哲學界、史學界、出版界、新聞界」，是「七界」。其實也是《五·一六通知》上的「五界」，因為「哲學界」、「史學界」可以並到「學術界」中。可見當初將「文革」運動物件的範圍，大致限定在意識形態，「文化」這個領域，真正屬於「文化大革命」。

而運動需要「整倒」的人數，不過區區「幾百人」到「幾千人」之間，就是頂格算，也不過幾千人，比起「反右」運動整倒的是幾十萬「右派」，仍是「溫柔」得多。哪料，「文革」最終的發展，乃是成萬千倍地增長，整倒的是幾百萬，受迫害的高達數千萬人。

當然，這是毛澤東1966年6月份的考慮和想法。後來，經過7月份在韶山滴水洞10多天閉門深思，毛澤東顯然改變了主意，決心將「文革」運動搞深搞大。7月下旬返京，到8月初，以「工作組」問題，終於「炮打司令部」，將中央一線的劉、鄧搞下去，並支持「紅衛兵」在北京及各省市造反，造成「天下大亂」的局勢。

這時，毛澤東是否想將「文革」運動控制在一定範圍，並儘快結束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除了上面關於「文革」時限，大致定在第二年春節前後外，在「革命物件」這個重要環節上，毛澤東雖鼓勵紅衛兵、造反派「造反」，但對各省市自治區等地方黨委，他也不過是要求轟一轟，燒一燒，也就讓其「過關」而已。甚至對劉、鄧本人，也沒說徹底打倒。

10月24日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彙報會的講話中，毛澤東特別強調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革命，允許改。」又說，「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與彭真不同。要允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報告（指劉少奇作的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筆者註）我們看了，是大會通過的，不能單叫他們兩人負責。」³⁵

第二天，在中央工作會議大會上的總結性講話中，毛澤東講了「文革」的動因及過程後，特意對在座者（包括劉鄧及各省市負責人）說：「這一次會議的簡報，差不多我全部看了。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犯錯誤也有原因。」³⁶

這些都說明，毛澤東在這時（1966年10月下旬）仍是打算將「文革」運動控制在相當範圍的。對各省市自治區一級的黨委負責人，毛澤東也僅僅是希望其儘快「過關」了事。尤其不希望關乎國計民生的農村和工礦企業，也象學校和文化單位那樣真正亂起來，影響國民經濟大事。因此，他親自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又讓人起草關於工礦企業文化革命的檔。「安亭事件」前，及「安亭事件」的處理上，周恩來、陶鑄堅持的兩條底線，實際上也是毛澤東這些意圖的直接反映。只不過周恩來、陶鑄從內心來講，反對「文革」動亂加劇，執行起這兩種控制大局的方針來講，更加堅決有力，更加態度鮮明罷了。當然，這不是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極左且有相當政治野心的勢力所願意看到的。

「安亭事件」的發生及其惡性演變，正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而必要前提是，他們察覺或摸清了毛澤東對「文革」進程，以及運動擴及的深度和廣度，已經或是即將發生改變。於是，他們很好地抓住並利用了這次機會。

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中，談及張春橋在「安亭事件」的所作所為時評價說：「張春橋這一手確實不同凡響，陰險詭譎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深知毛澤東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支持造反派的態度和要把『文化大革命』引向工礦的意向，因而忽出『奇招』，順水推舟地提供了全國第一個強有力的工人造反派。」又說：「他之所以先斬後奏，決不是因為『來不及』，而是要露一手……」這番評價，還是比較有見地的。不過，對毛澤東前後不同的這種心理變化，讓張春橋能夠如此「深知」，恐怕很大程度上與他離京赴上海前，與江青的那次私下見面並作了某種交底有關。江青肯定探知毛澤東這種變化，甚或與毛澤東進言或直接探討過。

王洪文是否在安亭臥軌

「安亭事件」是王洪文帶「工總司」赴京告狀而起，王洪文及其「工總司」又因「安亭事件」一舉成名並受益。王洪文自然是「安亭事件」的第一號主角。

關於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作用和作為，「文革」史家已有定論，這裏用不著再作多述。筆者在重新審視重新研究「安亭事件」時發現，從發掘的材料看，對王洪文在「安亭事件」現場，唯有一件事尚存疑義，這就是當年王洪文是否真的有過臥軌攔車之舉？

目前大多數「文革」著述，談及「安亭事件」，都認為，王洪文不僅作出了臥軌攔車的決定，而且是親自帶頭臥軌攔車。

其實，這種說法大可存疑。葉永烈在所著《王洪文興衰錄》（《王洪文傳》）中有《安亭事件》專章，其中《攔車臥軌》專節則認為，王洪文當年是「攔車臥軌」，而非「臥軌攔車」。葉永烈先生寫道：

當後來王洪文成為「英雄」，「臥軌攔車」成為他的「英雄篇章」。其實，據幾位當事者回憶，是這樣的：他們在鐵路兩側，有的揮舞著帽子，有的脫下上衣揮舞著。司機以為出了什麼事，來了個急剎車。在車子停住之後，很多人才跑上鐵軌，站著的、坐著的、躺著的都有。實際上是「攔車臥軌」，而非「臥軌攔車」。³⁷

葉永烈先生這裏說的，是第一次攔車，攔的是648次客車，時間是11月10日早些時候。接下來還有第二次「攔車」，是10日中午12時02分，攔的是14次特快。方法也是如前，先攔下火

車，再上的鐵軌。

也就是說，先後兩次攔車，均非有人事先在鐵道上「臥軌」以阻停火車。這是細節上也是「質」的差別。

至於王洪文本人，是否真正臥軌（哪怕是火車阻停後臥軌），則是始終缺乏相應的證據材料。而近年披露出來的關於「安亭事件」的材料，對王洪文臥軌攔車的說法則基本上是否定的。

王洪文的同黨徐景賢被捕入獄後，1980年7月13日在獄中寫的關於王洪文「安亭事件」的揭發材料中說：

1969年，王洪文曾帶我去看過「安亭事件」的現場，他還說：1966年他們工總司在文化廣場開過大會以後，到北站乘火車去北京告市委的狀，列車到安亭被阻止後，他們無法可想了，就決定攔住京滬線的快車，這樣可以把事情鬧大，讓中央出來表態。當時他們阻止的快車上還有外賓，交通中斷以後，果然震動全國，達到了預想的目的。³⁸

1969年，王洪文等人還在台上，談話的物件又是造反派內部的「哥們」，王洪文在帶他們看「安亭事件」現場，大有帶其參觀瞻仰，炫耀當年「英雄事蹟」的味道。其間卻並沒有「臥軌攔車」的敘述。使用的也僅是「攔住」、「阻止」這樣的字眼。可見，王洪文自己當年哪怕是對人吹噓，也沒說過自己曾經在安亭「臥軌攔車」。

粉碎「四人幫」後，王洪文自己在獄中對此事件的交待，則更是不僅否認了關於「臥軌攔車」的傳聞，而且更進一步稱自己連「攔車」的行動也沒參與過，自己在事件中的責任只是勸阻不力，對此需要負的不過是「領導責任」。

據王年一在《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中披露：「據檔案材料，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被訊問時說：『我雖然不主張他們攔截火車，也做了工作，但是主要責任還是我，因為我是頭。』」對此，王年一先生說：「傳說王洪文不僅臥軌，而且帶頭。這可能不符合事實。」³⁹

這從1980年代初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王洪文的審判及最終定罪的相關情況，似乎也可以得到證實。「文革」初期的1966、1967兩年間，王洪文曾經一手在上海策劃導演了三起轟動全國的大事件。其一就是這次「安亭事件」，其二是稍晚些時候（1966年12月）的「康平路事件」，其三是1967年8月的「上柴事件」（即武裝圍攻上海柴油機廠武鬥事件）。這三起大事件皆影響巨大，全國震動。王洪文也因此奠定了「上海工人階級的領袖」（張春橋語）地位。粉碎「四人幫」後，根據中央指示，組織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文革」中所犯罪行進行審理。然而在對王洪文的起訴及最後判決中，無論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公訴人的起訴，還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判決，其中只提到後兩次的「康平路事件」，及「上柴武鬥事件」。對「安亭事件」卻是隻字未提。

在1981年1月25日宣判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中，王洪文的罪行共有五項，分別是：「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傷人罪」、「誣告陷害罪」。⁴⁰其中就沒有「阻礙破壞交通罪」。在「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特別法庭審判中，對所傳的王洪文「臥

軌攔車」，並沒有作出事實認定。而沒認定的原因，顯然是缺乏足夠證據。

上海市委是否真有處置「安亭肇事者」的預案

「安亭事件」因張春橋的插手搞鬼，江青幕後支持以及毛澤東最後拍板，王洪文及其領導下的「工總司」成了勝利者。而作為對立面的上海市委卻最終成了失敗者，並從此被動，以至徹底整垮，不到兩個月就被奪權。

這種大逆轉是「安亭事件」的直接後果。不過，假如當初不是張春橋直接插手並就此成了王洪文及其「工總司」的後台，那「安亭事件」會有一種什麼後果呢？換句話說，若是上海市委成了「安亭事件的」勝利者，王洪文及其領導的「工總司」一幫人會面臨什麼樣的結局呢？

從一些材料和著述看，「安亭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為平息事態，確實做出了種種努力。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說：「上海市委一方面不承認工總司的條件，一方面又派人到安亭，送去衣服、食品，做思想工作，動員工人回廠抓革命，促生產。」對上海市委的舉措大加讚揚肯定，甚至到美化的程度。

然而，就滯留在安亭的2000多「工總司」人員來講，除少數頭頭及部份北上告狀態度堅決者外，多數人心情複雜，態度猶豫觀望。據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央文革小組駐滬特派記者在安亭現場給周總理的電話報告記錄：「據有些工人私下談，他們有顧慮，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個單位，除一個單位來的人很多，有300多人外，都是零星的來一些人，其中有些還是受過批評的，擔心回去後被圍攻，挨整。」⁴¹

王年一在《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裏也寫道：「事發後，上海市委立即要求並組織人員去安亭勸說『造反隊員』回廠。……12日，大部份『造反隊員』由各單位派車接回，上海市委還專門發了檔，要求各單位對回廠的『造反隊員』做好團結工作，『不要指責，不要跟他們辯論，不要扣帽子』。」⁴²

當然，這都是對一般群眾而言，而且是擺在臺面上的公開舉措。在私下裏，針對這次「安亭事件」的為首者，即「工總司」的少數頭頭和態度堅決，行動比較出格的骨幹人員，當局是否有另外一種嚴加處置的預案呢？

據上海工總司《工人造反報》上那篇《安亭風暴》中披露，上海市委的預案是有的。該文在「十一月十一日」條目中記載：

而以陳、曹（即陳丕顯、曹荻秋——筆者注）為首的舊市委和公安局已經把這次偉大的工人運動的組織者，十五名革命工人打成反革命，並作出定案。其中有的判處死刑，有的同志分別被判不同年限的徒刑，並已作出決定，打算將這些同志分配到安徽等地XX農場勞改。⁴³

也就是說，對包括王洪文在內的「安亭事件」為首者10多人，當局已預定了從死刑到有期徒刑不等的嚴厲處置預案。

除了這份材料外，筆者尚未見到其他類似材料可以證實（包括陳丕顯「文革」後的回憶錄）。此說成為「孤證」，大可存疑。不過，筆者認真分析後，倒是認為此說真實的可能性

極大。

《工人造反報》刊載此文是1976年5月中旬，此時，「工總司」已在上海成了氣候，從上海市委到各區縣及各局機關（包括公檢法等專政部門）也由造反派奪權並掌權。除許多知情者主動或被動「反戈」外，相當多的過去被視為「機密」、「絕密」的材料（尤其是針對當初造反派的材料）已視為「黑材料」被造反派掌握，或被公開揭發披露。因此，這些上海市委關於處置「安亭事件」帶頭者的預案，就不會完全是空穴來風，否則也不可能說得如此具體（如處置人數為15名，除死刑外判刑者分送安徽等地勞改農場等）。

當然，這都僅僅是筆者的推論，到底真相如何，還有待相關檔案材料的發掘，或是當事知情者的回憶證實，才能最終論定。這裏筆者想說的是，當年上海市委處置的「死刑」者中，肯定有王洪文無疑（可能還有「工總司」的另一個發起人潘國平）。而10年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又多了「組織反革命集團罪」（指王、張、江、姚反革命集團，而非「工總司」——筆者註）、「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傷人罪」等5項大罪的王洪文，也僅僅判的是無期徒刑。可見「文革」前和「文革」後，人們面臨的司法環境，確實大不一樣。這是社會的進步，也是中國司法的進步。

至於王年一先生《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裏所說的：「大部分『造反隊員』由各單位派車接回，上海市委還專門發了檔，要求各單位對回廠的『造反隊員』做好團結工作，『不要指責，不要跟他們辯論，不要扣帽子』。」這些仍然不免是美化上海市委的說法。這不僅是與上海市委私下裏對「安亭事件」的預案成尖銳對照，而且所謂對參與群眾不「秋後算賬」的說法，往往是一廂情願。經歷過或研究過「文革」前政治環境的人，誰都知道，從中央到地方當局，「秋後算賬」是一貫做法，歷次政治運動中尤盛。「文革」早期及「文革」中許多群眾無端挨整受迫害，多數來自「秋後算賬」。

留給後世的最後謎團

「安亭事件」距今已近40年，其間種種經過詳情及是非曲直，早已塵埃落定，歷史給「安亭事件」已作定論。不過，筆者在再次審視研究「安亭事件」時，仍是覺得這個當年就已震動海內外，並對整個「文革」進程造成巨大衝擊和影響的重大事件，其中還是有一些謎團，至今未解開，而且有些甚為關鍵。依筆者所見，「安亭事件」留給後世待解之謎大致有以下幾點：

其一，張春橋離京赴滬之前，面見江青時，兩人到底說了些什麼？江青給張春橋「面授機宜」，又到底交了什麼樣的底？

王力回憶錄中說，張春橋從政治局常委李富春那裏領受全權處理安亭事件的任務後，動身之前，特去見了江青一次。江張的這次見面，可以說肯定與張春橋的這次使命有關，而且兩人還可能談及整個「文革」形勢及大的動向。也就是說，張春橋動身前找江青摸底，或者是想看江青的對此的態度行事。江青也肯定會向張春橋這個自己最信得過的心腹謀臣交底。而這個「底」，顯然就是毛澤東對「文革」的考慮及下步可能的舉措。

需要指出的是，江青此時的地位，已經不僅僅是毛澤東夫人這種特殊身份了。她以副組長的身份實際控制著權力很大，而且權勢越來越大的中央文革小組，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左右當時的文革大局。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國政壇高層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匪夷所思的變化，毛澤東

重新回到第一線來主持常委會，直接領導「文革」運動，原來的書記處實際上已經不起作用。但下面卻形成兩套班子，一套是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一套則是江青實際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由江青直接對毛澤東負責，無須經過周恩來，也從不請示政治局常委及書記處（據說連陳伯達控制的《紅旗》雜誌也只是對毛澤東個人負責）。顯然，毛澤東與江青的關係，已不是一般夫妻關係，而帶有在中國根深蒂固的「宮廷政治」的味道了。

這種不正常的政治格局就給了江青極大的權力，也助長了她更加膨脹的野心。張春橋作為江青的心腹，在受政治局常委李富春派遣前往上海處理「安亭事件」時，專門面見江青密謀一番並討取主意，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這裏還有一個細節，即張春橋受命時，當時兼著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任一職的王力，曾出於好意，要給張春橋「派人協助」，卻被張春橋冷冷地一口拒絕：「我有人。」⁴⁴ 實際上張春橋當時並沒帶人赴上海，也沒從上海帶人去安亭，整個事件處理過程中，他都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他為什麼拒絕王力派人陪同（連王力從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協助也不放心），可見他當時就已經打定主意，此行只聽江青的，其他人誰的話也不聽。必要時「先斬後奏」，反正後面有江青給撐著。

但是，當天江青與張春橋之間談話的詳情，兩人到底講了些什麼？卻始終無人知曉，事件之後也從未對外間披露過哪怕隻言片語。目前江青已自殺身亡，張直到去世，在獄中對自己「文革」中種種罪行一言不發。江青和張春橋這次的談話恐怕只有作為「安亭事件」的一個謎團留給後世了。

其二，張春橋在處理「安亭事件」過程中，是否與江青有過通話，甚至保持「熱線聯繫」？

張春橋獨自去上海處理事端，並先後赴安亭、蘇州等地，前後達5天之久。實事求是講，其間也歷盡辛勞與反復（與當時造反風頭正健，自稱「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紅衛兵談判也不是容易事）。現有材料顯示，到上海的第一天轉赴安亭現場前，張春橋曾與陳伯達通過話。其後，在他在「工總司」五點要求上簽字後，立即給陳伯達通報，解釋自己「不簽不行」的理由。然而，就始終沒有與江青直接通話，也沒有保持「熱線聯繫」的記載。那麼，現在的問題是，其間張春橋到底和江青通話聯繫、請示過方略沒有？

如果通話聯繫過，那「安亭事件」屬江青幕後操縱，張春橋不過是前台人物無疑。若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說明張春橋此舉真正算是「先斬後奏」，先造成事實，再讓上面（即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至毛澤東）來最後予以承認肯定。張春橋的膽子和決心也不可謂不大。

從「安亭事件」的過程看，張春橋與「工總司」及紅衛兵等的最初的談判，也是不太順利和如意。11月12日晚談了一整夜，毫無結果，張春橋也堅守著上海市委及中央的那些底線沒有讓步，雙方僵持著。13日返上海後繼續談。正式談判之前，張春橋在上海市委會議室參加市委常委會，研究談判策略時，也是同意（起碼是沒反對）市委意見，不作讓步，同時還當場請示了在北京的陶鑄的。突然的大變化，出現在張春橋離開市委到文化廣場這段時間裏。到了文化廣場與「工總司」人員一談，就接受了對方五條並當場簽字。其間，沒有證據顯示張春橋與北京的江青或其他人通過話（那時通訊方式很落後很不方便，既無手機也無直播程式控制電話，與北京的長途必須通過市委總機或郵電局長途台）。

如果整個處理「安亭事件」的過程中張春橋確實沒有同江青通話聯繫過，那就證明張春橋

「先斬後奏」，不顧中央的既定方針以及上海市委的意見，斷然在「工總司」五點要求上簽字的膽子和決心，只能是來自離京赴滬前與江青的私下密談與交際。張春橋這樣做，確實也是冒著較大風險的。

其三，江青搶在陶鑄彙報之前，緊急求見毛澤東，毛江兩人談話內容如何？江青是怎樣說動毛澤東接受張春橋既反中央又反上海市委這種非常出格的「先斬後奏」舉動的？

江青如果沒同上海的張春橋有熱線聯繫，關於「安亭事件」的現場處理情況，那她是聽陳伯達、王力說起才知道的。她感到事關重大，事態嚴重，決定立即去見毛澤東，「要搶在陶鑄之前，不能等到明天。」最後，她如願以償。不僅讓毛澤東接受了張春橋在上海造成的事實，而且搬動毛澤東親自出面，召開常委會以壓制陶鑄和周恩來。江青與張春橋都成了勝利者，陶鑄卻受到毛澤東指責，在中央地位動搖，開始走下坡路。

關鍵因素，自然是江青見毛澤東那番談話。江青與毛澤東兩人這次談話的具體內容，外人不得而知，此後也似乎一直未見有任何隻言片語的披露。而主流「文革」專家學者，以及正式的官方著述，甚至對此重要而關鍵的事實予以回避，隻字不提，仿佛這件事從來就未曾發生過。可以說，整個「安亭事件」中，這才是留給後世的最大也最重要的待解謎團。瞭解了這些，也才領會得到，在「文革」時期，毛澤東如何將中共黨內和共和國高層政治，逐漸演變成隨意而為，甚至重大事情僅由夫妻兩人商量定奪的「宮廷政治」的。

註釋

- 1 王年一：《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載《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4期。
- 2 《安亭風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鬥爭史之一》，載1967年5月19日《工人造反報》。
- 3 《共和國史記》第3卷第148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 4、5 《安亭風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鬥爭史之一》，《工人造反報》第20、21期合刊，1967年5月19日。
- 6 王年一：《關於「工總司的成立」的一些資料》，載《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2期。
- 7 高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34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8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9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9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128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10 《周恩來年譜》（下卷）第8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11 《共和國史記》（第三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 12 王力：《「文革」第一年》，載《傳記文學》1995年第5期。
- 13 見王年一：《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載《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4期。
- 14 黃亦凡：《動亂之初——劉志堅將軍在「文革」初期的經歷和遭遇》，見《「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15、16 王力：《「文革」第一年》，載《傳記文學》1995年第5期。
- 17 見王年一：《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載《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4期。
- 18 《陳丕顯回憶錄》第9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 19、20 王年一：《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載《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4期。

- 21 葉永烈：《王洪文興衰錄》第132頁，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年4月。
- 22 王力：《「文革」第一年》，載《傳記文學》1995年第5期。
- 23 《陳丕顯回憶錄》第95-9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 24 王力：《「文革」第一年》，載《傳記文學》1995年第5期。
- 25、26 《安亭風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鬥爭史之一》，《工人造反報》第20、21期合刊，1967年5月19日。
- 27 黃亦凡：《動亂之初——劉志堅將軍在「文革」初期的經歷和遭遇》
- 28 《安亭風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鬥爭史之一》，《工人造反報》第20、21期合刊，1967年5月19日。
- 29 毛澤東這些講話，均見《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肖冬連等著，紅旗出版社1999年9月，第788頁。
- 30 王力：《「文革」第一年》，載《傳記文學》1995年第5期。
- 31 王靈書：《紀登奎與我的一次談話》，原載《瞭望》週刊。見《「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人物訪談錄》第80頁。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32 《共和國史記》第3卷，第142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 33 同上，第146頁。
- 34 同上，第101頁。
- 35 同上，第145頁。
- 36 同上，第146頁。
- 37 葉永烈：《王洪文興衰錄》第 頁，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年4月。
- 38、39 王年一：《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載《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4期。
- 40 《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 41、42 王年一：《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載《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4期。
- 43 《安亭風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鬥爭史之一》，《工人造反報》第20、21期合刊，1967年5月19日。
- 44 王力：《「文革」第一年》，載《傳記文學》1995年第5期。